

代政治制度这样一种更正式、更根源性的西化，即戊戌变法。

1919年开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在学习西方的方式上屡次失败后产生的一种结论。可以说是因为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权力结构层面进行的西化都暴露出了问题，所以从精神和观念层面开始推进西化改革，也即新文化运动。于是在加强对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批判的同时，也加快了对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推崇。例如，胡适把猛烈抨击儒教伦理道德和大家族文化的吴虞吹捧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于是乎，理念层面上的西化将曾展现了中华文明优越性的代表性圣人——孔子变成了批判和清算的对象。

韩国这边，甲午更张以后，制度层面上的西化是由日本持续推进的，这与中国的情况有些许不同。但是，知识分子对西化的看法和态度与中国基本相同。比如，在开放港口以后出现了主张东道西器的人，然后展开了建立西方式的制度和媒介的运动，接着开始了对封建婚姻和儒教文化的激烈批判。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全面展开西化。随着全面西化的推进，传统文化在理念上被认为是导致韩国和中国落后的重要因素，于是拥护中华世界观的呼声越来越低，主张学习西方的必要性的呼声越来越高。结果，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林和等韩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批评家有了这样过激的言论：“新文学从采用西方文学体裁（具体为自由诗和现代小说）开始形成，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文学史的所有时代都贯穿于外国文学的刺激、影响和模仿。新文学史是移植文化的历史。”^[4]中韩两国的西化正是这样以从表面上抹掉长期以来中韩知识分子之间共同秉持的思维方式和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的方式开始的。一直到韩国文学被定

性为与过去的文学及传统断裂的，即与中华文明相连的汉文学或古典文学没有连续性的西方文学的移植。

2.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失去了在东北亚起到了像拉丁语一样的作用的‘汉字’这一共同文学媒介，并且在广泛吸收西方文学，“新文学=近代文学”的思潮出现后，开始渐行渐远。在经历了冷战以后，这一差距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加深了。纵观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改革开放以来约30年的时间，就会深有体会。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韩国人认为中国文学是与我国文学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学。中国也是同样如此。

冷战体制下的中韩文学从表面上看是非常异质的。韩国文学在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中是作为一个商品存在的，而中国文学在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主义社会中是党的车轮。两国文学就这样站在了不同的对立面。韩国的作家通过艺术作品表达个人的资质和能力，靠卖自己的艺术作品维持生计；而中国的作家则按照党要求的方向完成作品，按等级从党那里领取工资维持生计。作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各不相同，作家的存在方式也各不相同。

然而，回顾过去，尽管两国文学存在着巨大的异质性，但在本质和结构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异。1949年以后的30年里，中韩两国都是政治压倒文学的时期，都是政治令文学历经艰难的时期。例如1977年发生的李英姬（音）教授笔祸事件。当时，韩国检方以违反反共法为由起诉了李英姬出版的《与8亿人的对话》一书。因为这本书“赞扬中共的政治社会现实及共产